

# 体育的本体论困境与非理性动因

## ——一种本质主义的反思与探究

王 涛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体育本质论领域内的本质主义派别在遭遇体育至上性消解的资本时代困境时, 在体育现象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中, 历史唯物论的体育本质观幽而不显。据此, 研究对本质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前提展开剖析与批判, 认为规定性思维无论怎样精致, 体育作为一个“属人”的概念, 其外延不断延展、内涵先后遗忘与层累是体育从人类社会演进处遗留下来的独特特质, 这决定了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本质论难以揭示体育的真正出身。在资本社会的边缘处, 人对资本社会权力的追求与反抗总会转捩为对感性动力正反两方面的追求, 超越性地统一了资产者与无产者对至上性追求的天壤之别。受此启示, 在资本的物化意识中, 体育的感性动力含义便是在资本社会被忽视的、十分鲜明的、极具活力的潜在的体育本质。“意识”只有在现实生活过程中, 作为存在的内在部分去领会“纯粹意识”, 人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才得以重塑。因此, 体育潜在的、独特的感性动力含义转捩为感性意识, 属于资本时代体育表征人类至上性要去积极探索的哲学路径。马克思、尼采和福柯的非理性思想进一步确立起感性动力的本体论维度, 由此“非理性—感性动力—感性意识”的诠释学关系成为人类应对资本时代体育至上性消解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前提。

**【关键词】** 体育本质; 体育哲学; 本质主义; 感性动力; 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4)01-0092-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409.004

目前, 在体育哲学研究中, 体育本质问题进入了一个不可言说或不必言说的“沉默境域”。“村BA”“村超”“天津狮子林桥跳水大爷”等体育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有学者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体育本质的回归。与此同时, “电子竞技”“虚拟体育”“赛博格技术”等又在频频突破体育本质的既有边界, 而他们与体育本质的冲突又是资本运作职业体育必然出现的问题, 资本正在悄然成为决定“体育是什么”的自在自为的力量。

从黑格尔的哲学本质论出发, 在资本社会中关于体育的“神圣形象”的认识处于人的至上性消解的时代边缘。从资本社会人的至上性消解这一哲学前提出发, 多数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消解在经济行为面前。借由此, 莫利斯大胆地把人的经济行为还原为人的物种本能行为<sup>[1]</sup>, 人的物种本能行为的至上性反映的是人在资本社会的至上性, 所以人类体育

行为的至上性融入了物种本能行为。就莫利斯的体育本质观而言, 受资本社会的现实影响, 在关于体育本质的认识转捩为关于体育的“非神圣形象”的认识中, 只有相应的哲学思想才有可能更充分地解释体育的至上性, 并通过哲学思想的考察和追问更好地找到体育的意义。长期以来, 本质主义派别忽视批判体育本质的哲学思想前提, 体育学界对“体育是什么”命题的理解一直桎梏在“词源考辩”“属加种差”的规定性思维中。规定性思维不能完全消除研究者本人预先持有的主观价值立场, 也无法把经验性认识转捩为理性认识, 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矮化为研究者手中的一种工具, 而非达成思想的目的。

收稿日期: 2023-12-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2YJA890025)。

第一作者: 王 涛(1987—), 男, 河南郑州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 体育哲学。

由此导致了对于体育本质的理解正在面临世界统一性越来越明显,知识统一性越来越疏离,意义统一性越来越破碎的状况。不同体育本质观之间的对峙,甚至彼此间过度批判,关于体育本质的理解在面对体育至上性消解的拷问时难以形成一种完整性的本体论立场。如何超越性地回答“体育是什么”,成为目前重塑体育的人类价值立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命题。

## 1 本体论困境——体育本质主义与哲学贫乏

本质主义派别把体育的本质问题用“体育是什么”这个命题将其框定在本体论领域,反复追问体育本质的“是其所是”,出现了体育本质的体质论<sup>[2]</sup>、技能论<sup>[2]</sup>、教育论<sup>[3]</sup>、文化论<sup>[4]</sup>、游戏论<sup>[5]</sup>、技艺论<sup>[6-7]</sup>、实践论<sup>[8]</sup>、行为论<sup>[9]</sup>和多本质论<sup>[10]</sup>等一系列论说。本质主义派别认为,体育本质问题不能混淆为体育的“质”的问题<sup>[11]</sup>。思考体育本质问题不是基于学者观察体育现象时的苦思冥想,并反复思考应运用何种哲学理论来诠释体育。反之,体育本质的思想之源,是不同体育工作者大量的、独特的体育日常生活体验、体育工作实践与体育理论追求,由此,探问使体育现象有意义的根本性存在是什么<sup>[12-15]</sup>。

按照哲学史的观点,本质主义派别追问“体育是什么”的规定性思维的哲学前提属于坚定地认为

体育有其本质的哲学立场<sup>[16]</sup>,这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本质主义范畴。反本质主义派别认为体育本质是对人在“此在”之中的体育的具身化体验的澄明,属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范畴。以此为坐标,笔者认为,近30余年来,我国体育本质问题的探讨按照其哲学蕴意,可基本划分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两大哲学路向(图1)。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探讨,认为体育应如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有其不变其中、稳定不变、超验的本质,和人对事物的思维相似,体育本质即体育在思维中的理性实体<sup>[17]</sup>,并且本质先于存在,体育的“是者”是规定体育存有的实体性力量。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探讨拒斥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它认为探讨体育的“是者”是对体育存在的遮蔽。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谈道:“作为对存在的探索,存在之领会向来已经属于此在,并且在每一次同存在者打交道之际都已经是‘活生生的’了。”<sup>[18]</sup>在反本质主义派别<sup>[19-20]</sup>看来,体育本质并不存在于对体育的“是者”的反思式追问之中,恰恰相反,体育如艺术一样,它的本质完完全全在当下“此在(dasein)”的创造过程与未来的面向之中,体育本质便是用不同的、各种与体育相关的哲学理论建构出的结果。因此,在海德格尔意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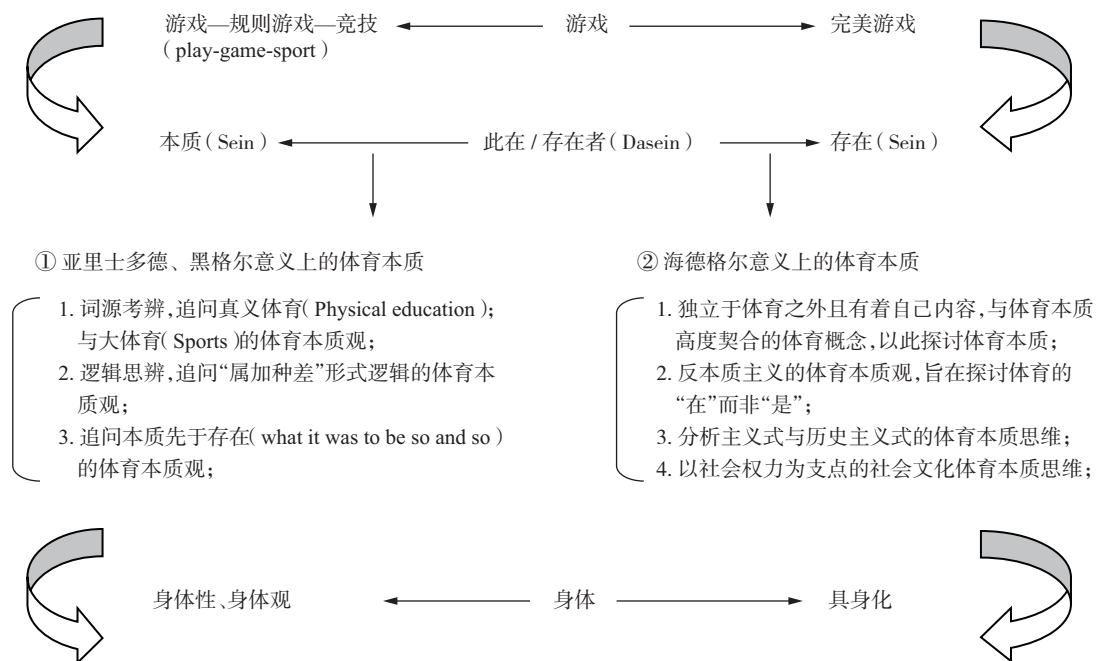


图1 体育本质问题的哲学路向

Fig.1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sport

探讨体育本质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在构建“我”与“体育”的关系上,并认为通过对“我”与“体育”的此在(dasein)关系的揭示,能呈现出有普遍性含义的体育存在(sein)。所以这一派别的学者立足于“我”对体育思考和发问的方式,也就是主体存在与客体存在的方式,以体育本质“此在”作为前提,面向“我在体育中”的主客不分的人的体育,探求存在者的存在,祛除存在者、类存在对“我”的遮蔽。

对此,高强等<sup>[21]</sup>认为,与其花费力气来探讨体育的“是者”,或者用“分析式”思维方式来厘定体育的“是者”的内涵与外延,如欧美体育本质游戏论学者运用分析哲学对游戏、规则游戏与竞技(play-game-sport)内在一致性关系的批判,不如“通过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转化将‘分析式’思维方式中对‘是’的追问转变为对‘在’的回溯,走向一种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方法。”由此,重新考察我国体育本质问题的哲学路向可效仿中国哲学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方式,与“诸子百家”思想方式颇具相似性的是我国学界对体育本质问题的探讨,其核心要点是体育本质的辩证论治从一种规定性思维转捩为相应的哲学思想,在此种转捩中,笔者认为考察的重点已不只是某种规定性思维的严谨程度和逻辑自洽,而是在与哲学思想的对话中,找到能更好地诠释体育的至上性的理论,因为就本质最终的涵义而言,追问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意义,追问“人”的至上性。

### 1.1 词源学的误读:“家族相似性概念”的体育本质考辨

真义体育观<sup>[22]</sup>与大体育观<sup>[23]</sup>深入地讨论了PE、sports两个西方词汇的文化内涵,弥补了我们理解两个外来“体育”术语时的文化贫乏。郭红卫<sup>[24]</sup>、刘桂海<sup>[25]</sup>等对sports的词源考辨与国外学者运用“分析式”“历史式”的哲学方式厘定体育概念的结论不谋而合,都注意到体育(sports)不以人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作为概念的核心旨意,人玩耍和操纵动物狩猎和竞赛可能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体育(sports)原初的表述,它以乐趣、游戏、愉快、竞赛作为体育(sports)的旨意。但词源考辨派别在遭遇了“家族相似性概念”流行时,就陷入一种语言学上的能指与所指的慌乱<sup>[26]</sup>,出现了“保守”与“进步”的内部分化。保守的一方其实滑入了对sports的考辨要以对physical education的考辨为哲学前提的规定

性思维论域,关于电子竞技,他们提出此E-sports非彼E-sports的见解,认为只有具备身体活动要素的虚拟体育,才能在语言学层面上称为E-sports;进步的一方则探寻更多能够表征体育本质的历史文化学要素,如暴力、仪式和政治权力等,借由探求体育本质的历史哲学意蕴、身体的知识型、体育的论述实践谱系来维系和增强体育本质的哲学张力,并由此开始偏向反本质主义立场。在派别内部,体育的至上性消解,始于此派别学者坚持认为“词源学”是揭示体育本质的准确的方法学。其哲学前提属于此派别坚持认为概念是本质的前提,对此,杨韵<sup>[27]</sup>批判性地指出,一味精细的词源考证只把对各式各样西语词典的考释视为探讨体育本质问题的基础内容。

### 1.2 形式逻辑的缺陷:“属加种差”体育概念派别的纷争

“属加种差”形式逻辑的体育本质观派别在体育学术史上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近10余年,体育的“邻近属”从“教育”“大肌肉群的身体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分别嬗变为“非生产性肢体活动”“技艺行为”“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和“身体活动文化”<sup>[28]</sup>;体育的“种差”范畴随之演变为“身体性运动体能实践”和“对人体自身进行干预以促进身心发展”。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属加种差”法的相关文献,发现在与体育邻近的学科领域,如艺术、美术、音乐等领域的比较中,仅有体育学领域运用该方法来界定核心概念,并把其拔高到揭示本质的高度。胡科<sup>[29]</sup>、张晓义<sup>[30]</sup>等强烈质疑“属加种差”对体育本质的规定,其观点包括:①“属加种差”法的逻辑适用性与本质的内涵不符;②“属加种差”法的主观经验缺陷;③“属加种差”法诠释体育本质的机械唯物论症候;④“属加种差”法严重缺乏哲学思维与反思思维。概括而言,“属加种差”形式逻辑的方式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以规定性思维解决体育本质的张力问题,反之在电子竞技是否属于体育等议题方面加深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对峙。

近些年在体育哲学领域,高强<sup>[31]</sup>、张震<sup>[32]</sup>等对体育哲学范式的批判强调,反本质主义派别的主张其实并非在否定体育有其本质,更多的是对本质主义派别的发问方式有较大质疑。换言之,由于缺乏哲学思想的前提,“属加种差”形式逻辑的方式不能



诠释“体育本质—有意义”的过程,如此一来,如果讨论体育的本质无法形成相应的意义,或只能形成形式逻辑的规定性意义,体育便不具有永恒不变的、脱离时间与空间规定性的希腊语词to on(即本体, substance)的含义,体育的至上性至少在哲学层面上也就无从谈起。

## 2 本体论局限:体育本质主义与哲学派别

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词源考辨派和“属加种差”形式逻辑派别显而易见地忽视了对其哲学思想前提的探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等对本质主义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思想被本质主义派别束之高阁,“本质”这一极具哲学反思内涵的概念在体育学界沦落为一个规定性的概念,对体育本质的探问被阉割为逻辑思辨与词源考释的文字游戏。

### 2.1 追求知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对体育本质规定性的哲学思维解体

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发问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发问借用现象学的方式,如借由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追问存在(to be),“此在”的含义先于本质的含义有着明显不同。在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本质论看来,“存在”属于一个逻辑思辨,而并非领会的概念,所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追问“本质”,也就可以是在追问“存在/是(being)”的过去,即“what it was to be so and so”<sup>[33]</sup>。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揭示事物的本质给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致动因、目的因,其中,后三者可以统属于形式<sup>[33-34]</sup>。它们与“存在”或“是”的关系在于:质料表示一个东西“是什么”,而形式表示一个东西的“怎么是”,所以,后者表示的是“本质的存在”或“现实的存在”,它比前者更深刻、更是真正的存在,前者只不过是“潜在的”存在。以此反观之,可清晰地看出,规定性思维对体育本质探讨聚焦于“体育是什么”的问题,侧重于对体育的质因分析,并不能独立地回答体育的至上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体育的至上性是由规定性思维与哲学思想对规定性思维的衍生双方形成的,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是把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本质的追求解释为一种“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辅车相依、彼此超越的

哲学表征。对此,邓晓芒<sup>[34]</sup>指出:“逻各斯成了有机生命的逻各斯,努斯的生命冲动则有了内在的尺度和规定性。”

此种见解对解释体育本质有非常大的启发,一方面,解释体育本质依赖规定性思维深受学理的传统所致。刘欣然<sup>[35]</sup>指出,由于physical education、sports、physical culture、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在汉语中都被译为“体育”,属于人的生命哲学一部分的,包容、发展和渐变的“此体育”与稳固、一致和不变的“彼体育”出现了对立,一个包含了亚里士多德“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体育”概念至少在我国体育学术的话语体系里是缺失的。本质主义派别认为对“逻各斯意义”的追求可以消弭此种对立,把“此体育”的意义解构在sports的语义里<sup>[35]</sup>,此种做法就阉割了“体育”的哲学前提,即努斯精神,把对体育本质的探讨降为对体育的质料因的批判。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此体育”与“彼体育”的对立是长期以来体育理论和实践形成的,甚至可追溯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方面主张俄耳甫斯教义神学目的论的身心二元论<sup>[36]</sup>,又同时倡导古希腊的竞技和裸体体操<sup>[37]</sup>,“此体育”与“彼体育”也是对立的,所以与解释艺术的本质可回归爱、美、真理的规定性思维与哲学思维的统一非常不同的是,一直以来解释体育的本质难以回归一种规定性思维与哲学思维的统一,其结果是对规定性思维的渴求大大超越了对哲学思想的渴求,认为体育本质是由其“逻各斯意义”奠定的观念本就属于一种异化的观点,扼杀了体育本质的哲学思想前提,即一种或多种努斯精神意义上的体育本质的考察。

### 2.2 本质对立的辩证:黑格尔“纯粹意识”体育本质哲学思想的局限

从黑格尔的意义出发,亚里士多德“四因说”解释的是世间万物的知性同一,可人对本质的追求从来不局限在对事物知性同一的追求之中。然而,在对体育本质的探问中,注意力多投入于知性同一的探赜,往往忽略了古希腊哲学家们对逻各斯和努斯的整体建构。体育本质并非表征为体育的质料因和形式因的统一,就会形成至上性。人经过同一律,总是在追求本质的至上性,也就是在追求本质的“绝对”。如此一来,何为本质的“绝对”呢?在黑格尔

看来,一种事物的本质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形式的抽象的,而绝非纯粹直观的包含,不能仅认识事物的自在,不去认识这些形式<sup>[38]</sup>。

“在存在里,一切都是直接的,反之,在本质里,一切都是相对的。”<sup>[39]</sup>在黑格尔看来,本质即一物通过它自身内的反映和对立物的反映,这样的过程属于从“自在”到“自为”的矛盾过程<sup>[39]</sup>。没有哪种“实存”不是在自身的反映和他物的反映的矛盾里作为矛盾被确立的,黑格尔指出:“显现或映像是本质之所以是本质而不是存在的特性。”<sup>[39]</sup>张震<sup>[40]</sup>认为,“扛着锄头上山”这种行为现象究竟属于生产行为还是休闲锻炼行为,与足球、篮球、乒乓球这些项目一样,都只显现或映像体育本质的某个局部。对于体育本质的认识,仅是在某一特定时代中,对体育的某个局部的理解。因为体育作为一个“属人”的概念,其外延不断延展、内涵先后遗忘与层累是体育从人类社会演进处遗留下来的独特特质。电子竞技显现与映像了体育本质的“竞技性”,与电子游戏比较,电子竞技更属于“体育”,同样地,马拉松比赛要比电子竞技比赛更为“体育”,因为前者显现或映像了体育本质更多的局部。对此该怎样把握电子竞技从“自在”的电子游戏演变为“自为”的体育竞技呢?杨韵<sup>[41]</sup>指出:“电子竞技的本质属于‘人一技术—世界’这一关系性存在基础上,形成的‘人一电子游戏—世界’的具身关系与诠释关系。”所以在电子竞技是否属于体育的命题中,“技术”和“电子游戏”本应作为重要的中介概念出现,换言之,我们不应在一个杜绝了技术世界的话语里,展开对电子竞技是否属于体育的讨论。

为了使本质与自我意识的发育服从同样的抽象思辨规律,黑格尔特别规定“本质”等同于sein、essence、wesen,“本质”属于过去的、消逝的存在。因为只有如此规定,爱情、道德、伦理、法权、信仰、良知等人类社会独有的活动才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性,进而批判人的现实性,从而追求人的无限性,也就是自由意志。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至上性由自由意志而来。古代竞技有着宗教意识的“环节的必然性”,所以古代的竞技包含在艺术宗教范畴,属于比爱情、道德、伦理、法权、信仰、良知更高一级范畴的人类活动,古代竞技仅仅次于启示宗教。黑格尔从人的精神这一距离体育本身非常遥远的范畴来反

思体育显现或映像了精神的某个局部,换言之,黑格尔关于古代的竞技的见解,建立在精神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之上,把人的身体运动、体能实践和技艺行为都抽象化为一种主体意识,由此形成了古代竞技的至上性。这一过程反映在精神现象学里,就是当自我意识的成长发育达到了宗教意识水平,并超越了自然宗教,与古希腊竞技相关的有生命的艺术宗教意识才会从直接的精神、自然的精神里孕育出来。黑格尔指出:“这种对神的没有固定性的狂欢必须安定在对象上,而那没有达到意识的满怀豪情必须创造出一个作品来,这作品面对着满怀豪情,虽然就像雕像面对着上述艺术家的满怀豪情那样,是作为一个同样完成了的作品,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本身无生命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我。”<sup>[42]</sup>

首先,黑格尔关于古代竞技本质的建构启示了体育本质属于思维上的实体,但现实中只能找到它局部的显现或映像。其次,它尤为重要地指明了不同学者苦苦探赜的体育本质,最终的归宿都属于对“纯粹意识”的局部性的理解,如体育本质的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并要求此种局部性理解对我们的经验性认识动手术,剔除与探赜到的形式所不能匹配的经验性认识。换言之,当介于领会和还没有完全领会意识哲学的本质论的确实含义时,最容易产生的“满足感”来自个体认为对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的把握,已属于对本质的真的把握。

以此为鉴,所谓对体育本质的把握,实际属于对体育从自在到自为过程的把握,在现象界,对这一过程的把握只能是对体育本质的局部性、阶段性的把握,但这并非意味着无法领会体育本质。恰恰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本质蕴于现象之中,因为对本质的领会总归于意识对存在先天地确立下了优先地位,属于意识的一种精神性而绝非物性的特质。此种前提下,所谓现象不过是本质展现给意识,促成意识不断发育为“绝对”的种种概念化的依据。但体育真正的出身,恰是这一关系反转之后,在超越性地认识“纯粹意识”之后的结果。所以黑格尔借用“纯粹意识”对古代竞技的建构,其体育本质观反映的是资本社会抽象地运作体育的一般知性规律,所谓从自在到自为的本质,是扬弃存在的“否定”过程,正如孙正聿<sup>[43]</sup>指出的,其实就是统治人们社会生活的抽象存在,资本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



流”的“秘密”。

综上所述,本质主义派别所渴求的体育的至上性不可能从规定性思维和本质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孕育出来,体育至上性的哲学起源另有其源头。

### 3 本体论探索——非理性对体育至上性的动因含义

#### 3.1 非理性的时代:“后形而上学”感性动力对体育本质的超越性回答

马克思和尼采解构了近代哲学以来的本质主义,指出本质主义无非是资本社会运行自身,以否定的方式不断升级生产关系,自由意志的定义无非是黑格尔用“无条件地从自身开始”来解释权利(right)的至高无上性的幌子,人对本质的追求遭到资本社会消解的本来面目就呈现出来,人的至上性便开始朝向“后形而上学”时代。孙正聿<sup>[43]</sup>认为,所谓“后形而上学”,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方式为指向,揭露人在诸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和表征人对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向往和追求,以‘有限的理性’反思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现代性反省中的‘后形而上学’”。人为何会走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呢?卢卡奇<sup>[44]</sup>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商品结构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一种物的关系。由此,现代社会体内生活的人生活在阶层壁垒清晰且严格,彼此个人化、数字化和碎片化的“僵尸”社会里,人的意义不论是存在的意义,还是本质的意义,脱离了社会的总体性原则便不能生成,而物化现象说明了本质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在现代社会体内遭遇了肢解。由此在人的异化和物化现象中,后现代哲学把目光从本质主义转移到感性动力问题。

周黄正蜜<sup>[45]</sup>指出:“康德第一次在哲学史上将感性作为独立的基本概念,并在认识、实践和审美三个领域都赋予了感性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46]</sup>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内部生活的人应开始从感性的、对象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来确认自己的至上性,并逐渐舍弃以往对本质主义确立人的至上性的信念,去追求感性动力问题承载人

的行为、道德、审美和生存意义的含义。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和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人的实践确认了人与人彼此形成的本质力量,本质力量既离不开人与人彼此的感性交往,感性交往形成本质力量又是道德、审美和生命的感性意识对物化意识的超越。福柯继承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思想,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把感性动力视为现代社会体内生活的人与资本社会建构的资本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生存美意识形态“铁笼”对抗的一种最可靠的要素,视为现代人探寻、重建自身生存方式的生存美学的支点。由此可见,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人对意义的探求的底层逻辑已不属于对本质深信不疑的信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sup>[46]</sup>,不仅人追求意义的思想与行动只会出现在此岸一方,人追求的意义也只会由对感性动力的探求与实践来超越性地回答并反馈于人。

“体育”这一概念虽然有着“此体育”与“彼体育”的逻各斯意义上的残缺,但它为现代社会体内生活的人提供了一种持久且全面的感性动力,打破了物化意识除了把人视为抽象的劳动力之外,就把人抛弃在无聊、虚无、消费社会和资本符号征用身体的牢笼里。体育因张扬具身化的意向性,成为涌动自我意识的精灵,在资本社会为挽救人 and 人回归于人提供了归途。“足球腐败”“体育制度的壁垒”“球员个性文化与资本文化的对峙”等体育的异端之所以严重损害了体育的本质,也是由于上述现象损毁了体育内在的感性动力要素,损毁竞赛规则,把竞技的结果变成可操纵的对象,垄断体育资源,把体育功利化地视为国家竞争的机器,扼杀球员个性,把职业球员的个性与运动信仰视为无足轻重的亚文化,等等。但“此体育”借由感性动力问题来重新审视自身,并不局限于具体的体育现象,属于在形而上学层面重新发现体育的意义和资本时代人类对于体育意义的追问,也就是说,虽然在资本社会,体育具有感性动力的潜在含义,但此种感性动力的含义仍属于一种较为蒙昧的意识,需要哲学思想和实践把体育的感性动力含义转捩为一种持久的感性意识。

#### 3.2 非理性的含义:“后形而上学”体育至上性的哲学思想前提

古希腊时代,表征生命内在冲动的“努斯精神”

就映射出一种非理性的含义。投射到“此体育”方面,与俄耳甫斯教派的灵肉二元论相关,但在根本含义上抵牾的便有神话形式的狄奥尼索斯教派对“狂欢仪式”的崇拜,狄奥尼索斯教义对美与爱欲之神阿佛罗狄忒的崇拜被古希腊艺术家们视为灵感之源。西方精神的源头属于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也即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交织,理性的最高境界属于迷狂<sup>[47]</sup>。早期的非理性思潮主张意志、直觉、情感、欲望和信仰属于世界的本原和本真,其社会现实作用还属于一种抽象的、理论的感性动力。但经过市民社会资产者与无产者阶级斗争的历史洗礼,非理性的本体论哲学表征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生产力是基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sup>[48]</sup>,资本社会生产力发展至其尽头,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在资本社会的边缘处,人对资本社会权力的追求与反抗总会转捩为对感性动力正反两方面的追求,超越性地统一了资产者与无产者对至上性追求的天壤之别。所以非理性只有在承认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上,并不肆意妄为地推崇人具备理性的无限性,而是对人的种种无限性的成就做出人类性的反思,才能确保它不会被误读为煽动感性动力的要素,反之启蒙资产者具身性地进入看似荒诞与喜剧,实则体验无产者的感性意识的“疯狂”。王德峰<sup>[49]</sup>指出:“人就必须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由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中。文明的创造,作为一种必然性,植根于人本身的存在结构中。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人是被惩罚为自由的。”笔者认为,恰是在非理性思想的成熟过程中,融入了历史唯物论、存在主义哲学对它的诠释,即一种关于人的尺度的根本性转变,所以非理性思想更加认同人的至上性恰恰在于人完善并超越了规范和逻辑的社会精神存在,也就是感性意识,非理性才从一种有煽动性的要素转捩为一种涌动人的感性意识的要素。

尼采和马克思在人的存在这一本体论层面开拓性地探讨了感性动力的本体论同等原则,即非理性。尼采关注人的存在在形而上学层面所能实现的“非理性”,他推崇竞技,强调身体崇拜,认为在竞技中“非理性”达到的“权力意志”是重建人的主体存在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关注人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注资本社会物质运动中的“非理性”。他揭

示了人在物质利益面前处于“前一理性”(非理性)状态,并由这种“前一理性”(非理性)状态出发揭示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头足倒置的意识形态。社会事实并非由“绝对”的意识、不考虑其出身的自由意志来建构的,它的底层逻辑源自人在关乎其生存的物质利益问题前的非理性,是由物质利益不平等引起的社会权力运动建构的。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工场依赖机器化的方式生产出商品并创造资本,这是决定人的体育生活样貌属于前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的考量,随之工人的体育生活的感性动力,就是工人借由参与体育生活来反抗社会权力这一异化的感性存在关系。正如此,前文所述的莫利斯的体育本质观仅仅解释了人在资本运动面前,服从资本运动规律的行为与动物谋求领地、趋利避害的行为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但莫利斯没有看到资本的另一面,即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实际属于一种对人而言异化的感性存在。资本的界限正在于资本本身,在于资本运动的阶段性终点是社会权力对资本的摧毁。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到这一点的无产者最能体悟到意识从来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要求人以感性意识形成“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原则,而感性意识是反思和超越人类命运的一种意识,也正是“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原则的源头。

对于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人之所以迫切需要属于感性动力的“非理性”,福柯给出了最为浓墨重彩的诠释。福柯的“非理性”继承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非理性思想,是对资本物化现象的直接批判,福柯认为:“疯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闯过了资产者划出的界线,使得它自己成为资产者伦理神圣界限之外的异乡人。”“对理性来说,疯狂只是它的秘密活力。理性发现疯狂原是它自己的一个形象——其实这是排拒除魅的手段,它排除所有可能的外在力量、所有无法化约的敌意、所有的超越性记号;但就在同时,理性也把疯狂放在它自身活动的中心,说那是它本质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时刻。”<sup>[50]</sup>福柯把“非理性”视为人的至上性的一种始源性要素,是先于笛卡尔“我思”的人类性要素,“如果我思的确是绝对的开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狡猾精灵更存在于我思之前。”<sup>[50]</sup>

体育哲学的具身认知和现象学思考多次强调,



体育如果有其本质含义,也是由它在“我思”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意义所决定的,突破在于如何在现象界悬置本质的时候,把体育的“我思”之前的存在还原出来。换句话说,“体育就是人格教育”“健全人格,首在体育”此种对体育本质“我思”式的诠释,并没有切中体育的本质含义的哲学始源。此种“宣言”对于理解体育本质的真正价值,仅在于它把“宣言”转捩为论述实践,并且还是一种历史性、权力性都相对比较薄弱的论述实践。关于资本时代体育本质的不同观点,或多或少都有着论述实践的权力谱系,所以要解释资本时代体育的本质,还可以走一条在回溯身体的知识型嬗变的基础上<sup>[51]</sup>,挖掘和建构相应的权力谱系文本的另一条道路。但不管对非理性做出历史唯物论的诠释,还是做出后形而上学的诠释,都无法磨灭非理性在后工业、后资本社会催动和衍生感性动力的事实。

在思想史上,“非理性”表征过体育本质的嬗变,并且由此种表征为哲学带来活力。古希腊的竞技往往带有极度暴力的特征,这种“暴力状态”对人的意义,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理性哲学家们都非常否定。然而,阿纳克萨戈拉的“努斯”说对古希腊社会现实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试图让古希腊哲学走近古希腊竞技,并认为人在竞技仪式中的这种“暴力状态”满足理性走向更完美时的需要,也就是诗性、酒神的神性与迷狂。张震<sup>[52]</sup>曾为“非理性”正名,他认为,由“非理性”与诠释武术本质的高度契合更应说明武术本质只有围绕人的道德实践而来的存在含义,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对本质的求索本身,而是它构建的哲学体系。刘桂海<sup>[53]</sup>在体育本质形成的人类史中寻觅身体暴力的细节,他认为体育即起源于“野蛮的暴力”,体育的文明化演进经过的是一个暴力完全地呈现,后经过仪式化地表演暴力、洗礼暴力、政治隐喻暴力的过程。体育从未与身体暴力分离,只是经过文明的洗礼,“暴力从彰显一个人的战斗力演变为庄重的节日、入城仪式、加冕或是重要的婚庆典礼上的贵族比武;暴力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力的象征。”如果从哲学角度看,这一过程展现着身体暴力转捩为社会权力的过程,属于人类社会极为特殊的一种力的形而上学重建过程。

福柯对“非理性”的精心改造暗指着与“非理

性”共享同一源头的人类文化活动,如文学、艺术和体育(身体的伦理),其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本体论含义的转捩。在资本时代,体育的本体论含义不再关注于体育本质的逻辑规定,而是以往在本质的边缘处被我们忽略的本质要素,因为这些微观的细节背后蕴藏着人们关于本质说不尽,但又真正离不开的要素,即感性动力。笔者认为,目前中外哲学界还没有能对“非理性”这一词汇达成一种哲学的高度共识,还普遍地用“失心疯(irrationality)”这一词汇来界定“非理性”。实际上,“非理性”与“失心疯”只有社会现实层面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在福柯看来,正是与古典时代的理性一脉相承的社会学把疯狂视为了社会学的“反叛”,疯狂的含义才在社会学意义上构成了对社会学的感性动力。此社会学根基说明,在形而上学层面“非理性”属于更高一级的理性才能把握与驾驭的对象,它属于艺术、宗教和哲学范畴,也是更高一级的理性必须批判与不可或缺的对象。在资本时代,体育对于人类生存的贡献在于它为人类解决感性动力不足问题提供的解答,所以“非理性—感性动力—感性意识”的诠释学关系成为我们审视各种体育本质观派别的一种重要考量,正是在此哲学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地反驳人的至上性消解的各种体育本质观。

#### 4 结语

在资本时代,变动不居的体育现象不断涌现,恰是人们的体育行为对体育本质的实践表征,但与此种实践表征对应的形而上学,却处在人的至上性被资本消解的边缘。词源考辨派别、“属加种差”形式逻辑派别用规定性思维佐证体育至上性的路径纠缠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缺乏对体育本质的哲学思想前提的批判,因此当遭遇“家族相似性概念”和体育本质张力问题时,便消解为一种僵化的、抽象的知性同一的体育本质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意义上的体育本质观属于借由传统的形而上学,以规范和逻辑来探求体育的出身的本质观,但在资本时代,前者受困于不同体育本质观派别对体育的质料因和形式因的解构,后者虽然匡正了体育本质的含义,但其表征并非资本时代体育的真正出身。囿于资本时代,人对物化意识的切身感受,形成了人超越物化意识的渴求。借由此种路径,感性动力超越性地回答了人



对意义和本质的追求,体育的真正出身恰恰在于人践行游戏、竞技获得的力、美和意志的行为表征衍生出的感性动力。体育的历史唯物论的起源也正在于,萌生于“我思”之前的、艺术性的、宗教性的非理性意识闪现于物我意识之中,此种闪现与“我思”之后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建造的社会意识有着根本性区别,因为前者要以最终形成感性意识为诉求,来超越性地解释一切彼岸的本质、意义与价值的追求,终究不过是对感性动力的此岸的追求。经过马克思、尼采和福柯改造后的“非理性”高度表征着资本时代批判资本和衍生资本的感性动力,形成了“非理性—感性动力—感性意识”的体育本质诠释学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德斯蒙德·莫利斯.裸猿[M].何道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 [2] 张洪潭.体质论与技能论的矛盾论——百年学校体育主线索厘澄[J].体育与科学,2000(1): 8-16.
- [3] 邵天逸,李启迪.为真义体育立业:林笑峰《健身教育论》的理想追索与价值探寻[J].体育学刊,2021,28(2): 21-27.
- [4] 张春燕,钟明宝.体育竞争文化论纲[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5): 105-112.
- [5] 张军献,沈丽玲.竞技本质游戏论——本质主义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0,17(11): 1-8.
- [6] 刘欣然,罗林.竞技本质技艺论——基于本体论的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1): 54-59.
- [7] 张琪,夏春,龚正伟.竞技本质技艺论的质疑与竞技技艺论的建构[J].体育学刊,2018,25(2): 9-16.
- [8] 田菁,杨金田,贾文彤,等.体育本质实践论[J].体育学刊,2007,14(1): 15-19.
- [9] 刘欣然.体育本质行为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38(4): 7-12.
- [10] 于文谦,杨韵.竞技体育中身体的失落与复归[J].体育学刊,2013,20(5): 17-21.
- [11] 于涛.体育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 [12] 张洪潭.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J].体育与科学,2008,29(3): 81-86.
- [13] 奚明秋,赵晓飞,张晓义.也谈体育本质与体育教学问题——与《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作者商榷[J].体育学刊,2008,15(12): 6-9.
- [14] 田展玮,侯胜川.技击还是攻防: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体育学研究,2024,38(1): 72-84.
- [15] 王子朴,马德浩,陈秉信.内涵、领域和特征:体育价值观研究进展[J].体育学研究,2020,34(1): 42-48.
- [16] 程卫波,董琛,李斌,等.体育本质阐释中本质主义倾向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11): 148-156.
- [17] 刘欣然.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全面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9] 杨韵.体育的生命冲动与意识绵延——基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体育本质解读[J].体育科学,2011,31(3): 87-92.
- [20] 张震,杨丽.武术本质层次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 34-37.
- [21] 高强,许浩南,程一帆.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3): 60-71.
- [22] 魏立宇,杨薇,韩飞.“体育”不是“身体教育”质疑——兼论中国体育本质研究的症结[J].体育学刊,2011,18(3): 1-6.
- [23] 熊斗寅.“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兼与韩丹等同志商榷[J].体育与科学,2004(2): 8-12.
- [24] 郭红卫.Sport考论[J].体育科学,2009,29(5): 86-95.
- [25] 刘桂海.“体育是什么”:一个概念史的考察[J].体育与科学,2015,36(4): 32-37.
- [26] 于思远,顾帅,刘桂海.“体育”(sports)的本质与概念——“生命”的本体论回归与“存在”的认识论超越[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8): 11-20.
- [27] 杨韵.西方游戏论视域下的体育本质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 [28] 刘世磊,徐明魁,黄彦军.审视与探索:基于“属+种差”法的体育概念再定义[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9): 24-29.
- [29] 胡科.体育本质研究的迷思与转向[J].体育学刊,2015,22(5): 5-10.
- [30] 张晓义,张少伟.逻辑思维对体育本质追问的哲学反思与修正[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7): 58-65.
- [31] 高强,徐凡,汪维,等.从“体育是什么?”到“体育哲学是什么?”——始于“电子竞技是否体育”争议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1): 29-38.
- [32] 张震.体育哲学的历史发生、学科贡献与时代使命——基于全球思想史的视角[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 20-31.
- [3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34] 邓晓芒.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片面定向的检讨——以中国哲学为参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5(4): 106-113.
- [35] 刘欣然,余晓玲.“是”的本真与“体育”的所是——体育本体论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48(7): 10-15.
- [36] 赵林.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上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
- [37] 王海燕,王润斌.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文化意蕴与钩沉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12): 66-79.
- [38] 张世英主编.黑格尔词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 [39]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40] 张震.电子竞技是否属于体育的“本体论约定”阐释与解

- 决路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1):38-44.
- [41] 杨韵.电子竞技的体育属性何以引发争议——技术哲学视角下的反思与诠释[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2(3):62-69.
- [4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3] 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44]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5] 周黄正蜜.康德哲学的感性之维[J].浙江社会科学,2017(3):66-74.
-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2009.
- [47] 邓晓芒.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现代哲学,2011(3):46-48.
- [48] 唐正东.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0(2):1-6.
- [49] 王德峰.哲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 [50] 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 [51] 张震,甄岗鑫.中国竞技话语的身体知识型之近现代转捩[J].体育与科学,2023,44(6):10-18.
- [52] 张震.武术本质实践论[D].郑州:郑州大学,2012.
- [53] 刘桂海.体育:如何而来:一个文明史观的考察[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1):32-40.

## Ontological Dilemmas and Irrational Motivations in Sport: An Essentialist Reflection and Inquiry

WANG 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essentialist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field of sports essentialism encounters the dilemma of the capital era, in which the supremacy of sports is dissolving, and in which the reality of sports phenomena is changing day by da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is hidden but not visible. Accordingly,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essentialism and its philosophical premise, and argues that no matter how exquisite the prescriptive thinking is, sports, as a “human” concept, has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its extension, and successive forgetfulness and cascading of its connot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Aristotelian and Hegelian essentialism can hardly reveal the true origin of sports. At the edg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people’s pursuit and resistance to the power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will always turn into a pursuit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nsibility motivation, transcending the stark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suit of supremacy by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Inspired by this, in the materialization consciousness of capital, the sensory and dynamic meaning of sports is a highly dynamic essence of sport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objectivity can be reshaped only by understanding “pure consciousness” as an inherent part of existence in the process of real life. Therefore, the potential and unique sensibility motivation of sports shifting towards sensory consciousness belongs to the philosophical path of actively exploring the supremac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orts in the capital era. The irrational thoughts of Marx, Nietzsche, and Foucault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of sensibility motivation, and thus the hermeneutic relationship of “irrationality-sensibility motivation-sensibility consciousness” became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remise for humanity to cop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upremacy of sports in the capital era.

**Key words:** nature of sport; sports philosophy; essentialism; sensibility motivation; irrationality